

新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述论

第二卷 隋唐五代



陈友冰 主编
本册编著 陈友冰



商务印书馆

新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述论

第二卷 隋唐五代

主编 陈友冰

本册编著 陈友冰

方正燕 著

陈友冰 主编

陈友冰 著

陈友冰 著

陈友冰 著

陈友冰 著

陈友冰 著

陈友冰 著

商务印书馆

200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述论. 第二卷/陈友冰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ISBN 7-100-05298-X

I. 新… II. 陈… III. ①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隋唐时代②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五代(907~960)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 第 00237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教育部省属重点文科研究基地
“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重点课题

新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述论

第二卷 隋唐五代

主编 陈友冰

本册编著 陈友冰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5298-X/I·163

2008年7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2%

定价: 42.00 元

序

余 恕 诚

学术研究需要熟悉学术前沿,占领学术前沿。对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而言,所谓学术前沿,一是研究的薄弱点与空白点,另一是研究的最新动态与发展趋向。这两个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现状的熟悉程度。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整理当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成果,寻绎其研究历程,探讨其研究规律,归纳其研究特征,明辨其研究得失,也可以使我们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少走弯路,从而也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因此,整理与研究当代的学术成果,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

回顾 20 世纪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比较辉煌的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 20 世纪初期,另一个是 20 世纪末期。无论从研究的量和质上说,20 世纪末期都超过了 20 世纪初期。这一时期以“文革”结束,中国内地实行改革开放(1978 年)为标志,习惯上称之新时期。新时期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随着西方哲学、美学、文学甚至跨学科的各种流派理论的涌入,文学的研究角度日趋多元化,研究手段也不断翻新;随着书籍文献的大规模整理,地下文献不断被发现,电子文献日益丰富,研究文学的视野也空前开阔,特别是一些

新材料被发现,部分地改写了中国古代文学史。因此,整理与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成果,尤为学术界所关注。陈友冰君主编的《新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述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成果之一。

《新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述论》全书120万字,分为《先秦汉魏六朝》卷、《隋唐五代》卷、《宋辽金》卷、《元明清近代》卷,分别由刘运好(第一卷)、陈友冰(第二、三卷)、吴微(第四卷)三位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者撰稿。纵观全书,作者始终能够以冷静的目光审视汗牛充栋的当代研究成果,在架构上既有高屋建瓴的宏观描述,也有深微细密的微观评介。全书按照整体一断代一个案的逻辑思路,将内容分为:新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的整体研究;断代文学研究及文学流派、文学思潮、文体或总集的研究;各时段重要作家作品研究。此外,为了方便读者查阅,每卷末还附录了本卷所涉及的这一时段文学研究的重要著作和论文索引。

与现有的同类著作相比,不满足于资料的汇集,而侧重于研究历程的寻绎和总体研究特征的宏观把握,是本书的特色之一。作者或以研究类型进行分类,凸显研究的热点与空白点,如第一卷“绪论”部分将新时期中国古典文学宏观研究概括为研究方法的研究、文学史研究、文学分类研究、文学的民族特征研究、文学与儒释道文化关系的研究等几种类型,不仅将纷繁的古典文学宏观研究类型化,而且也透视出目前研究的热点与空白点。或以时间为序列,凸显研究的历程与特征,如第二卷关于新时期唐代文学研究“绪论”部分,在分析其研究的时代和学术背景的基础上,将这一时期的唐代文学研究分为“文革”结束和新时期开始(1978—1980)、

活跃与新变(1981—1989)、沉思纵深期(1990—2000)三个阶段,而且又将不同阶段的研究内容进行分类评述,这将新时期唐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及其阶段性特征完整地显现了出来,使读者对唐代文学研究的总体风貌及其特点有清晰而全面的了解。

对研究中不同取向、不同方法、争论双方不同观点,不是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而是分类梳理,揭示出每一观点的产生与发展的源流变化,在“述论”的“论”中分析不同观点之得失,是本书的第二个特点。如第四卷在分析元杂剧繁荣的原因时,“述论”将几种代表性的意见一一列出,并就“与元统治者对戏曲的态度有关”、“与科举制度的兴废和当时知识分子地位有关”等学术界一直存在着的两种不同观点进行追溯与评述,既力避简单的主观取舍,又分析其不同观点之得失。这样,使读者可既以看出作者的千虑一得,又可以避免隅照之失。

突出新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新特点以及不足之处,并分析其研究的可能发展趋向,或针对研究的薄弱点与空白点,提出研究设想与学术期待,是本书的第三个特点。如第二卷在评述苏轼研究时,作者分析了新时期苏轼研究呈现出的六个新特点:对苏轼评价重新定位,研究范围越来越广,评价越来越高;资料汇集整理和文献学研究更加充分;研究领域逐步拓展,研究课题逐层深入;研究思想趋于多元,研究方法趋于多样;研究史以及其他相关研究开始起步;研究组织建立并定期开展研究活动。针对苏轼研究的薄弱点,作者提出五点研究设想:文献学研究和文本研究尚须进一步深入;新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必须和传统的文献学研究和知人论世的社会学研究结合,文化学研究、人文精神的评判必须与文

学自身价值和规律的研究结合;避免偏于一隅,应从整体上宏观把握和综合研究;研究视野上有待于进一步拓展;苏轼学术史、研究史方面的研究队伍和研究力度尚需加强。这样,既梳理了过去的研究成果,也指出今后的研究方向。

对新时期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薄弱部分或其他研究史论著较少提及的研究内容,也详细介绍和评述,是本书第四个特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历来就不够均衡,有些研究领域、文学总集、作家作品等,囿于资料、观念或其他因素的影响,一直成为研究的薄弱环节,一些研究史论著也往往语焉不详,如神话研究中的神格研究,神话系统与结构研究;楚辞研究中的宋玉、唐勒研究;隋代文学研究,晚唐五代词中的“花间派”研究;宋代散文的整体研究,宋词中的周邦彦研究,辽金文学中元好问以外的其他作家研究等,本书均设有专节加以评述,既实事求是地揭示了这些领域新的研究成果,也希望引起后来研究者的注意,同时也显示了作者细针密线的功夫。

由于本书三位作者都是我的好友,友冰君邀刘、吴两君合作出于我的建议,本书又是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重点项目的重点研究项目之一,中心的同仁一直希望它早日出版。因此,当此书付梓之际,写了以上一些话,聊陈鄙见,且亦藉以留下我和此书曾有因缘的记录。

2004年8月22日
于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目 录

序	余恕诚
第四编 隋唐五代文学研究	1
绪论	1
第一章 新时期隋唐五代文学研究历程	8
第一节 “文革”结束与新时期开始(1978—1980)	8
第二节 活跃与新变(1981—1989)	12
第三节 沉思与纵深(1990—2000)	37
第二章 隋代文学研究	81
第一节 研究概况	81
第二节 主要作家研究	85
第三章 唐五代文学综合研究	92
第一节 唐诗研究	92
第二节 唐代古文研究	113
第三节 唐五代词研究	121
第四节 唐人小说研究	133
第五节 敦煌学研究	152
第四章 初唐主要作家研究	162
第一节 “初唐四杰”研究	162

2 新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述论(第二卷)

第二节 陈子昂研究	178
第五章 盛唐主要作家作品研究	186
第一节 孟浩然、王维研究	186
第二节 高适、岑参及边塞诗研究	213
第三节 李白研究	236
第四节 杜甫研究	273
第六章 中唐主要作家作品研究	315
第一节 元稹、白居易及新乐府运动研究	315
第二节 韩愈、柳宗元研究	353
第三节 李贺研究	400
第七章 晚唐主要作家作品研究	435
第一节 杜牧研究	435
第二节 李商隐研究	449
第八章 晚唐五代词研究	482
第一节 花间派及温庭筠研究	482
第二节 李煜及南唐词研究	495
附录 隋唐五代研究论著索引	506
著作部分(1978—2004)	506
论文部分(要目, 1978—2004)	537

第四编 隋唐五代文学研究

绪 论

煌煌唐风,这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为骄人的一章;唐代文学研究,也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乃至文学研究中最有华彩的一段。唐代诗文的结集和探讨,已为唐人自身所乐为和乐道,历经宋元明清学者们的爬梳剔抉、细斟博引的丰厚积累,更成为一座既晶莹又伟岸的丰碑。进入 20 世纪后,以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鲁迅为代表的一批古代文学研究者,面对世纪之交转型期的动荡,鉴于传统的“义理、考据、辞章”已难再吸引世人的注意,也为了使文学研究从经学、史学中剥离出来而形成独立的学科,开始在文学观念和价值评判标准上进行改造变革以适应世变,以期建立现代意识的学科体系。但遗憾的是:或是由于后来追求目标的转向,或是由于政治立场的纠缠,或是由于学术思想的变迁,他们都没有对自己发现、倡导的新的研究观念作系统的整理和进一步的探讨,仅停留在启蒙这一步,有的甚至从原来的起点上后退。他们的传人或后起者如郑振铎、陈寅恪、唐圭璋、夏承焘、陆侃如、冯沅君、刘大杰、谭正璧、严望耕、台静农、郑骞、卢元骏、潘重规、苏雪林等,有着学贯中西的丰厚积累,又有着创作研究兼胜的实际体验,本可以凭着自身的优势和站在巨人肩上的优越位置去建构唐代文学研究的现代化

体系,但由于外族的入侵和内战的频仍,面对空空的米袋和烽火连天的三月,能在颠沛之中不忘著述,能在难以容忍的境遇之中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坚忍不拔地从事名山事业,使中国学术一脉孤悬、赖以不坠,已属相当难能可贵,遑论学科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1949年以后,包括唐代文学在内的古代文学研究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成为唯一的指导思想,对作家生活时代的政治、经济状况的分析和作家阶级属性的判定取代了对作家心灵的把握和作品艺术美的鉴赏。这种观念和视角的转换弥补了传统研究中对作家所处时代的忽视以及那种封闭的研究状态,但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片面的理解和在古代文学研究中机械的搬用,从1949至1978年这三十年中,这种观念的变化并未使包括唐代文学在内的古典文学研究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古代文学研究学科体系更无法得以建立,相反连知人论世、商讨意境、探究心史这些传统的治学方法也一律斥之为封建主义的唯心史观,至于王国维、胡适等人引进的西方文学观念也统之为洋奴哲学皆加以摒弃。一方面割断传统,一方面自我封闭,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体系只剩下两个标准:一是政治标准,即看这个作品是否具有“人民性”;另一是艺术标准,即从社会效果上判别艺术水平的高低。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之间,又有个主次之分:“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①在执行这两个标准的实际过程中,“人民性”又往往被狭

^①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1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62页。

隘地理解为只有揭露封建黑暗,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才具有人民性,民歌、民谣、民间故事等民间文学才真正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流和代表:“不把民间文学放在文学的正统地位上就不能反映文学发展的真实面貌,也就只能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①而艺术水平的高低也被简单地规定为是否采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根据这一标准,白居易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而“从唐初的宫廷贵族文学,王维、孟浩然的隐逸田园诗派,一直到中晚唐的各种形式的唯美主义诗派,构成了唐诗发展中的反现实主义逆流”,^②一概应予否定和排斥,因为“内容愈反动的东西愈带有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加以排斥”。出于历次运动和政治斗争的需要,这种标准又会因人、因时而异,例如在“文革”的“评法批儒”运动中,李白、柳宗元、刘禹锡,甚至从50年代以来一直受奚落的李商隐这时都成了“法家”代表人物,成了历史上批儒的正确路线的代表。李商隐不再是颓废的唯美主义诗人,而是“晚唐诗坛反分裂的鼓手”,就连他的缠绵伤感的〈无题〉诗,也成了“晚唐儒法斗争的一面三棱镜”。^③

从1949至1976年这近三十年中,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主潮就是不断地掀起学习和批判运动,来学习和执行乃至强制推行这两个标准,以清除“封建主义的糟粕”,改造遗老遗少,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为当前的政治斗争服务”。这种破除的动

① 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页。

② 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第212页。

③ 〈晚唐儒法斗争的一面三棱镜〉,《中山大学学报》1975.6。

力实际上产生于两个方面：一是来自历次政治运动的压力。从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胡适唯心史观起，经1952年批判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1954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1957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1959年“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包括古代文学研究在内的思想文化领域一直把上述标准作为衡量是非与谬误，乃至革命与反动的界尺。这些接连不断的运动迫使大批学者不断地作自我批判或批判他人。这种批判和自我批判在古典文学（包括唐代文学）研究中所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首先，它造成了中国古典文学主要研究对象和主要精神的缺失。因为它在形式上似乎在肯定人民在历史上的主体地位，实际上却否定了中国古典文学真正的创作主体——历代文人，也否定了由他们所创作的，包括咏歌山水，歌颂友谊、爱情、忠诚、气节、风骨等在内的表现中华民族优美情操的一切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在民族传统文化上张扬了一种虚无主义观。其次，败坏了学术风气，毒化了研讨空间，毁坏了学术品格。除了特定时段（如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的前后，^①1962年4月30日“文艺八条”颁发之后，文艺创作和文学研究都产生过一个相对宽松的时期）和少量文章外，这种学习或争论往往泛政治化，即用政治斗争的手法乃至对待政敌的方式对待学术争论，稍不合己意便罗织罪名，“上升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看待问题”，断章取义、移花接木来定欲加之罪，甚至以此来判定研究者政治倾向乃至政治身

^① 这一口号的提出是1957年2月，见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毛泽东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93页。

份。例如,林庚在1958年写了篇〈盛唐气象〉,该文以磅礴的气势、遒密而又深厚的论证来证明唐诗无愧于那个时代,“盛唐气象是一个具有时代性格的艺术形象”,“盛唐气象所指的是诗歌中的蓬勃气象,蓬勃不只由于它发展的盛况,更重要的乃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①眼光的阔大、立论的纯正和内在的热情,使我们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读起来仍怦然心动,但当时却被当成资产阶级学者“歪曲社会本质来为自己的文学观点服务”的“一个典型例子”,^②并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受到点名批判。^③另一位唐诗研究者傅庚生的〈说唐诗醇美〉在《光明日报》(1962.2.25)上发表后,马上就有人站出来批判,说“醇美”“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美学家唱滥了的调子”,并由此推而广之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入,阶级斗争表现得特别尖锐复杂,这种阶级斗争反映为意识形态领域内资产阶级思想与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尤其表现得激烈尖锐。傅先生今天提出这种醇美标准,只能把人们引上歧途,绝不能让它自由泛滥。”^④这种学术风气的败坏和学术品格的毁灭所造成的伤害是难以估量的。直到今天,仍有人唯我独尊,以我画圈,合我意者则是“重大突破”、填补了什么什么空白,将其棒杀;逆我意者,则是断章摘句、含沙射影将其棒杀。过去一切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出发,今日则一切从权势、金钱出发,浮躁

① 《北京大学学报》1958.2。

② 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第6页。

③ 〈“盛唐气象”的阶级实质是什么——批判林庚先生〈盛唐气象〉一文超阶级观点〉,《北京大学学报》1958.3。

④ 李裕光:〈应当正确引导读者鉴赏古典诗歌〉,《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459期。

炒作、曲学阿世等等。诸如此类学术界的弊端中,当年的“棍子”、“文痞”影子仍依稀可辨。再次,这种用批判和自我批判方式所形成的除旧布新会使学者丧失人格的自尊和学术上的自信,是更严重也是最久远的一种伤害。一开始,有的研究者清除自我、接受这种新的观念和批评标准还可能是迫于形势,是被动地接受,但年复一年、长此以往,也就变成了一种习惯,一种思维定势,一切都从此角度来思考和接受,从而丧失了自我。至于 50 年代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人,由于当时国门的封闭,“不知有汉,遑论魏晋”,更是把此当成天地之间唯一正确的标准。

另一种则是来自研究者发自内心的真诚。这批人或投身于当时的解放运动,或留在内地未去海外。他们怀着对新中国的期待和美好未来的憧憬,也出于对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新鲜感,想去适应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尝试学习和运用这种新的观念和方法,特别像“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等,听起来让人耳目一新。陆侃如、冯沅君 1954 至 1955 年在《文史哲》月刊上连载两人合著的《中国文学史稿》,即是根据“是否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来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同情人民疾苦”这一标准对作家作出评价。其“引言”和“结语”两度历举中国历代伟大作家名字,诗人中有白居易而无李白,剧作家中有李玉而无王实甫。其原因就在于白的“秦中吟”和“新乐府”“主题思想非常明确,主要是批评社会上、政治上种种不合理现象,特别对于统治阶级的罪行予以无情的揭露”。李玉则是因为他的《清忠谱》“直接取材于当时社会的现实生活,政治倾向性比较鲜明,斗争性比较强烈”,“表现着群众抵抗人民公敌的战斗热情”。今天看起

来也许会觉得不可理解,但在当时,确是这批学者很努力的尝试。萧涤非在1959年出了本古典文学论文集,书名却叫《解放集》,以此来“纪念祖国解放第十周年”。书前有一首诗,写于1951年作者在北京“革命大学”结业之时,很能代表古代文学研究者上述的心态。诗题为《感谢党的教育》,诗曰:“起死回生手,翻天覆地人。二年刚解放,万事尽鲜新。废铁能成剑,熔炉大有神。我今从此去,服务为人民。”书中有篇专论,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六周年而作”,题为《坚持文艺为政治、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①亦可看作是当时相当一部分研究者的努力方向。50年代古典文学方面有几次规模较大的讨论,都是集中在如何学习运用上述标准来判定古代作家作品,如1953年展开的“怎样看待和处理古典文学遗产”大讨论,1956年前后进行的“中国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问题”大辩论,1957年前后进行的“古典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关系”的大讨论,1958年前后进行的“中国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大讨论等,可视为当时的研究者转换观念、适应上述批评标准的努力。

俱往矣,随着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古典文学研究终于翻过了最沉重的一页,完成了它的涅槃。

^① 《解放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8页。

第一章 新时期隋唐五代文学研究历程

第一节 “文革”结束与新时期开始(1978—1980)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随之结束,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唐代文学研究也由十年的荒芜停顿开始复苏。以唐诗研究而言,据统计:从1978至1998年这二十年间,共出版各类有关唐诗的著作近千种(还不包括通史、通论、综论、总集中的唐代文学部分),论文万余篇。^①其中点校出版的唐人别集、合集或经宋元明清人整理、校勘、笺注的唐人诗集近100种,现代学者研究唐代文学的著作和唐代文学选本,如闻一多的《唐诗杂论》,朱自清的《李贺年谱》,高步瀛的《唐宋诗举要》、《唐宋文举要》皆得以重版。可以这样说:20世纪的唐代文学研究是历代观念变化最大、研究手段最多样、成果最丰富的一个世纪;1980年至20世纪末又是这个世纪中变化最巨、成果最丰的一个时期。从时间上说,这二十年是这个世纪的晚秋;从收获上说,它又是个金色的秋天、丰收的季节。而1978至1980年这三年,正是这个金色秋天到来之前拂去暑热

^① 张忠纲等:《中国新时期唐诗研究述评》,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